

主办：中科院大连化物所离退休服务中心

2007年7月30日（第9期）

内部交流

10

传承革命优良传统 ★ 促进我所和谐发展

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

战火中的青春

□ 王坪



王坪，1920年10月生，河南信阳人，1937年8月参军，1937年10月入党。曾任东北军区（沈阳军区）青年部团务科长。丹东市委书记处书记、吉林教育厅副厅长、大连化物所党委书记等，1983年离休。

1939年初，我随部队到达新四军五师驻地——四望山根据地，但1939年下半年形势发生了变化，国民党开始不断制造摩擦。当时四望山的干部很多，组织决定疏散一部分干部到边区党委。我被调到干部队，随三团南下，我依依不舍的离开了工作近一年的四望山区。这是我第一次长途行军，只带了自己的衣物和少量的干粮，没想到要经过一段崎岖的山路。当时我正患疟疾，时不时发作，虚弱的身体再加上没有长途行军的经验，让我几乎吃不消了。感谢同志之间的战友之情，同志们常常帮我背着行装跟随部队前进。但我还是免不了掉队了。那时只要发现有人掉队就要向后面喊“向后传XXX掉队。”“向后传王坪掉队”成了大家的笑柄。终于到了宿营地，我已是满脚打泡，浑身无力，躺在地上起不来了。尽管十分狼狈，但还是跟上了大部队。

部队继续向前走，下了大山走上了平坦大路，却又遇见了敌情。我们赶快隐蔽，等敌情过后继续前进，过封锁线时部队与日本鬼子遭遇了。前面的部队已经和鬼子打起来了，这是

我第一次经历战斗，好在我们是随三团一起行动，因此，我并不害怕。因为三团是正规部队，战斗力强。而遭遇的日本鬼子是辎重部队，打了一阵就逃跑了，我们还缴获了不少战利品呢。

部队行至湖北安陆赵家棚，我被三团留下任宣传干事。刚到赵



李先念主席会见辽宁省、大连市及原新四军五师部分同志

家棚，一场激烈的战斗就打响了。三团奉命到路东打顽固分子刘梅溪，并于二团一起协同作战。部队首长进行动员，宣传股长潘德表交给我的任务是做战地报道。

我随部队由西经过封锁线，只见铁路两旁岗楼林立，僵蛇似的铁轨上不时有敌人的装甲车呼啸而过。拂晓前后我们冲过了铁道线。没想到还要渡过一条大河，这可是一条不易过的河啊。男同志还

编者的话

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之际，《夕阳正红》编辑部从化物所离退休老同志中选出4位参过军、打过仗的革命老同志撰写了战争年代回忆录片段，作为本期《夕阳正红》纪念建军80周年的专刊登出。

这4位革命前辈是王坪、刘时平、王文龙和周光才，通过回忆他们在不同战争时期的亲身经历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。他们忠诚和热血保卫祖国的献身精神，激励着我们更加热爱人民军队，增强国防观念，学习和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，为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尽一份余热。

好，可以脱下衣服趟过河，我们女同志就只能穿着衣服过河了。冬天刺骨的寒风中湿透的衣服只能到宿营地才能用火烤干。当我们快步赶到路东，战斗已经打响了，子弹不时从我的头上飞过。有经验的同志告诉我：“不要怕，子弹远着哩！”我就跟着部队往前跑，接近前线时我们找到一户人家停下。不一会儿传来胜利的喜讯，我赶快写了简单的捷报，大意是“我们占领了XXX高地，消灭了XX敌人”等。在这次战斗中二团政治处主任路登同志牺牲了，他是我在战教团一起工作了一年多的战友，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同志，当时我心里特别难过。

经过这场激烈战斗，顽固分子刘梅溪的部队被我们消灭了。虽然我的报道篇幅不长，但确实起到了战地报道、宣传和鼓舞士气的作用。

战斗结束了，我们返回赵家棚休整。从四望山出发到达刘梅溪，从路东返回路西，我没有换过一次衣服，更不用说洗澡了。我发现身上有一些小虫在爬。这一发现，引起了所有女同志的警觉，都赶快脱下衣服仔细查看，原来是虱子。过去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小生物。大家烧起一堆火，在火上抖衣服，只听得劈啪作响。因为人人都有虱子，就不觉得害羞了。李先念师长戏称叫“革命虫”，革命的人才有，不参加革命的人是没有的。

(下转4版)

到延安，见到毛主席

□ 刘时平



刘时平，1917年11月生，河北省冀县人。1938年5月参军，1938年8月入党。曾任解放军第六军宣传部副部长，铁道兵政治部宣传部部长，国务院农垦部政治部副主任、副局长，大连化物所党委书记等，1984年离休。

1938年秋，根据当时的形势，部队准备派部分同志到延安去学习，行军路线是循着马栏—店头—羊泉—富县—甘泉—崂山—延安前进。

记得头一天行军路途不长，住在马栏附近，邵部长指示我学做群众工作，去负责动员转送队伍的毛驴。长期不行军了，虽说精神抖擞，可是走了一天之后，两腿也有些发软，但我认为正是学习和锻炼的又一重要开端，战胜疲劳本身就是一种锻炼。怀着很高的兴趣去找乡长，那时当地群众还习惯地称乡长为乡苏维埃主席。陕北的农村，是在塬畔上散乱着的一些窑洞，参杂着一些羊栏，地上满是羊粪，我高高低低的找了好一会儿，才找到了那乡长的家，是住在崖底一个天然的石洞里，崖的半腰滴着水，使人想起水帘洞。我拿出介绍信正尔八经向乡长交涉，他慢悠悠地不肯定的话，我就没咒念了，只是催他办，我说晚饭后再来定准。回去我把这情况报告了邵部长，部长笑了笑，立即把马夫叫来，要他跑一趟，这个刘志丹的老游击队员，不用打听，一下找到了乡长的家，那乡长对他也相当亲热，招呼他上炕抽起烟来。过了一会，马夫同志说：“……这队伍是邵大人带的哩。”乡长一听，立刻肃然起敬，又说起毛驴的事，乡长说：“没问题。”就这样简单，事情就办成了。这件事，对我教育挺大，我想，我虽然觉得是陕公毕业，懂得了一些道理，但距离真正革命工作的需要是多么遥远啊！

在路途中，有的地方还住着所谓友军—第二战区闫锡山的部队。经过一个叫做店头的镇子时，那镇子是以出好酒闻名的，我们要在那里休息一天，镇上住着闫锡山的一个连，我们就向他们作统战工作。休息的那天下午，在一个大戏台的广场里，和他们开了联欢会，双方都有代表讲了话，我们演出了小节目，唱歌，啦啦队非常活跃，当啦啦队拉他们唱歌时，他们非常之窘，站起来唱了一个进行曲，实际上无所谓唱，只是士兵们闭起眼睛来拼命地喊，相形之下，军阀的军队是很落后的。

行军最后一天，同志们情绪异常高涨，从崂山一出发，就不断唱着歌，走在铺满河卵石的山沟里，一点也不吃力。到下午后，看到一个远处的山口，人们就以为过了山口就看到宝塔山了，实际上又走了好久，拐过几个山口才看到了久所向往的宝塔山。一见宝塔，同志们自动地整齐了步伐，精神抖擞起来，有的同志尽情高歌：“啊……延安，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……”

如果说，当你一到别的城市，首先看到它的外貌的话，那么，一到延安，是被她的情绪所吸引，首先引人注

意的是宝塔山下，那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队伍，那身穿灰军装带红领章的男女青年们整齐健步前进的队伍。你这时必然会想到，新中国啊，就从这里开始诞生了。那延安城，虽称不上规模宏大，但背倚高山，面临延河，镇于三面山口之间，却也称得上庄严雄伟。市区虽无高楼大厦以及耸入云霄的烟囱，但是以延安城为中心，各学校、机关，一排排一层层的新窑洞顺着山势向四方扩展开去，却更有一种不同凡响的气魄，感到中国人民是在这里获得了新生命。还是《延安颂》唱的好：“无数个青年无数的心，埋藏着对敌的怒吼”，“热血在您胸中沸腾！”

我们的队伍，在南门附近，受到了抗大同志们的欢迎，我们高呼着口号穿场而过。延安由于被敌机的轰炸，机关和群众这时早已搬出城外，城内已经没什么人了。我们被指定住在北门外抗大一个大队的房子里，准备在此休整，待命，几天后，开始向晋察冀去。

到延安的第二天晚上，抗大总校为我们组织了欢迎晚会，地址在城内天主教堂里，罗瑞卿副校长和邵式平同志都在会上讲了话，最后由吕班同志演出了大鼓。

这次到延安最幸福最难忘的是有机会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。那是到延安两三天后，那天中午，阳光把广场照得十分暖和，我和几个人正在广场讲话，邵式平同志满怀兴致地从外面回来，告诉我下午集合队伍到大研沟附近那个礼堂，那里陕甘宁边区正召开一次参议会。原来并



1957年春，刘时平（左一）随王震（右二）部长等在海南岛农垦基地考察热带作物。

不知道听什么报告，进门之后，报告已经开始，一看才知道是毛主席在作报告，这虽然是头一次见到毛主席，但是毛主席的面貌和神采，却是非常熟悉，就像早已见过，经常见到一样。毛主席那时还比较瘦，就像一九三六年斯诺为毛主席拍照的那穿红军服装的照片差不多，穿一件灰色大衣，那时毛主席的身体，显然还没完全从长征后的衰弱情况下恢复过来，还不停地咳嗽，毛主席浓重的湖南话，有时听不懂，但大致可以听得懂，是讲“论新阶段”的内容，讲话慢慢地，打着手势，给人以从容不迫的感觉。因为是第一次见到毛主席，心情异常激动，真是思绪万千，感到沉浸于幸福之中。毛主席讲完话后，即离开了会场，这时我想：这是一生最幸福的时刻了。

智胜强敌顽匪

□ 王文龙

1946年秋，国民党破坏停战，向解放区大举进攻。东北战场上，我军诱敌深入同时，组织武工队坚持敌后斗争。

我在四纵队十师政治部副主任车学藻率领的武工队。队员多是从部队排级干部中抽调来的，还有少数地方干部，加上警卫排，共一百多人。我是副连级，当了一名班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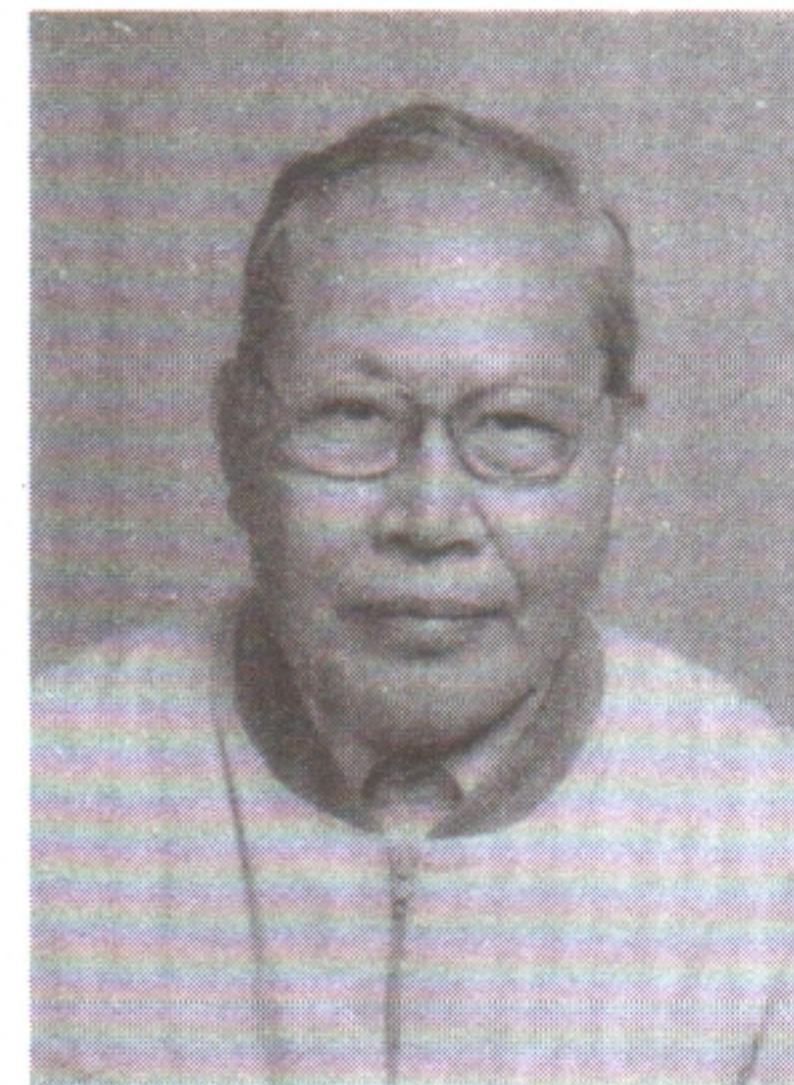
我们活动在凤凰城、赛马集两县（辽宁省）交界一带山区，打击国民党建立的大团、清剿队等反动武装，袭敌运输线，使敌后方不得安宁。新开岭一仗，敌52军25师被我四纵队消灭后，敌人加倍袭击我们。大年初一，出动一个团连同一些大团和清剿队，号称三千人，誓要把我们吃掉。初二中午时分，我们回旋到大西沟。在沟口一个山头上，车主任深思过后，要我带五名队员在这里吸引敌人，掩护大队转移。

大队翻山去后，我对大家说：“随时准备战斗，把手榴弹整好。”手榴弹是为不得已时与敌同归于尽的。曾有一名武工队员伤后被俘，敌人凶残的折磨他，往他头上浇油活活烧死。

正月初二，本该寒冷，这阵儿却温暖异常，向阳处雪面晒得水浸浸的，他们五人抓起虱子来。

我顾不上捉虱子，要观察敌情。周围一片寂静，我信步走下山头，沟口左侧有个一人高的山神庙，庙前有个大石台，我在石台里边坐了下来。我有长短两支枪，长的是马拐子，剩13发子弹，短的是勃朗宁驳壳匣子，早就只剩1发子弹。两支枪子弹都上了膛，开着保险。我不禁低头思索起来：没有枪声，许是大队已经转移出去了……我们六个人将被3000敌人包围……任务完成了，我们怎么办……面对几百倍的敌人，又没有子弹，打是没有用的，只能从敌人缝隙突出去……不知想了多久，抬头时猛见前方不足500米远，敌大部队正由南向北密集推进，转头往左一看，一股敌人贴着山边已经摸到我跟前，距离不过30米！我本能地将握着的长枪子弹射出，一个敌人应声倒下，敌人的步、机枪一齐朝我打来，我转身往沟里转移，边指挥五名队员撤离。

沟底平坦，为了摆脱敌人，必须跃上南面的山梁。这山梁最低处有



王文龙，1930年6月生，山东荣成人，1943年11月参军，1948年6月入党，曾任广州军区司令部参谋、42军后勤部副部长、大连化物所副所长，1990年离休。

三、四米高，很陡，坡面晒化了一层，脚一踩上就打滑，我连窜三次，都滑了下来。这时，敌人离我只有十来米，他们不打枪了，吵着抓活的。我的帽子被打掉，左袄袖打了个大窟窿，绝望之中，我把两支枪扔到坎上，退后两步，使出全身力气往上冲，终于冲了上去。我拾起两支枪，心想这会儿下雪就好了。真神奇！我盼下雪，天果然下起雪来，一阵儿小片飘过，转眼乌云盖顶，鹅毛大雪倾泻而下，五步就看不见人了。敌人无奈地漫山喊叫：你们跑不出去了，快出来投降吧……听喊声敌人在北东南三面包围了我们，我们就向西往山顶转移。

上到顶峰，少了一人，情况不允许也无法寻找，我带领四名队员从西坡下了山。在山脚下遭到一股敌人伏击，这时雪虽然小些，但天色已晚，我们甩掉了敌人，借着夜幕绕到曾家荒沟，直奔沟顶我常去的一家。刚敲门，大娘就拉我进屋焦急地说：“他们（敌人）刚刚来搜过，说我们被层层包围住了，让百姓看见就去报，不报杀全家。”

大娘的茅草小屋，矮的进门须低头，小得一眼看遍全家，穷到一无所有。后墙上挂着个刚有点亮的小油灯，这是过年，平常烧松树条照亮。油灯下小桌上摆着过年祭祖的供品：一只熟鸡，两边几个黑窝头，她边做边说：“你们在准饿了，家里没啥东西，就把这个吃了吧。”我们两天没吃一点东西，为了突出重围，含泪吃了大娘祭祖的供品。

沟里沟外狗叫得厉害，我决定马上离开这里，往东经李子沟、佟家沟绕到敌人背后的大青沟，再奔楼子山。此山路极少有人走，大娘儿子愿带路。

出门就爬山，夜黑得伸手不见掌，高一脚低一脚，几步一摔跤，走的精疲力竭才爬上崖口，实在走不动了，大娘儿子说左上边有一洞，我

决定去看看。

是个石洞，我们都挤了进去，几天来太疲乏了，一斜歪就睡着了。突然，我被狗叫声惊醒。天刚亮，我往山下看去，下面就是李子沟，不足300米。一群群国民党兵背着枪到处掏鸡窝撵抓老百姓的鸡，惹的满沟的狗都窜跳起来，鸡叫，狗叫，鸡飞狗跳墙。国民党军队的匪徒行径，我们亲眼所见。

李子沟有了敌人，大青沟就去不成了。敌人随时可能上山，必须即速转移。地形限制，只能顺着北坡下山，坡陡得站不住身，好在有层积雪，让大娘儿子走后，我们坐在雪上往下滑，连出溜带轱辘，好歹下到山底。大家没怎么伤着，只是我两只鞋轱辘掉了，亏得脚上穿着袜子，比赤脚在冰雪上走好些。

这时太阳出来了，乌云散了，雪停了，黑夜过去了，山上山下光秃一片，失去了一切屏蔽，我们完全暴露。四面都有敌人，往哪里去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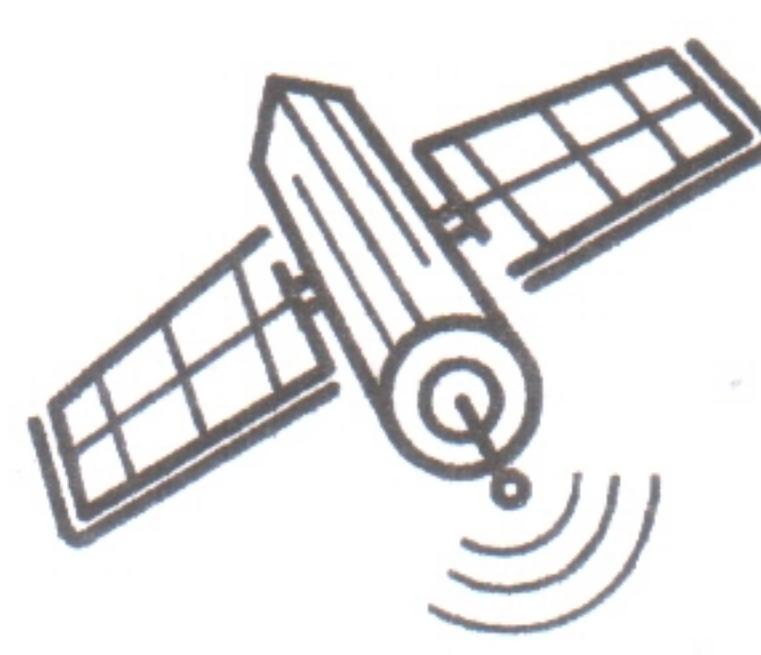
不能莽撞，不能迟疑。从地形熟悉考虑，我决定北去楼子山。怎么去？走山路，敌人肯定搜山；走平地，遇敌难脱身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！



处境万分危急。急中生智，我想：“敌人以为我们离不开黑夜，离不开山，只能夜间出来靠山与其周旋，把白天、平地、大道当成他们独霸的天下，那我就出敌不意，白天走大道一边走，我一边说：“大家脚下要快，举动要从容，佯装大团样子，遇到敌人只能冲过去，冲不过去就拼。”

我决断对了，敌人都上了山，在拉网似的搜索。山上不时响起阵阵枪声，那是敌人搞火力侦察、火力诱捕。一路上我们未与敌人遭遇，只在几处近山的地方，被山上敌人看到，每当这时，三八年入伍、给车主任当过警卫员的老衣和原是区农会主任的老曹，就斜挂着枪朝山上摆起手来，弄得敌人糊里糊涂。太阳偏西时，经过一个名叫松树嘴的大村庄，被松树嘴大团留守在炮楼上的几个家伙看出，但他们没敢开枪，只是探头探脑地向下盯着，我们大摇大摆地绕过村庄继续北进，太

（下转4版）



辽东半岛上空击落P2V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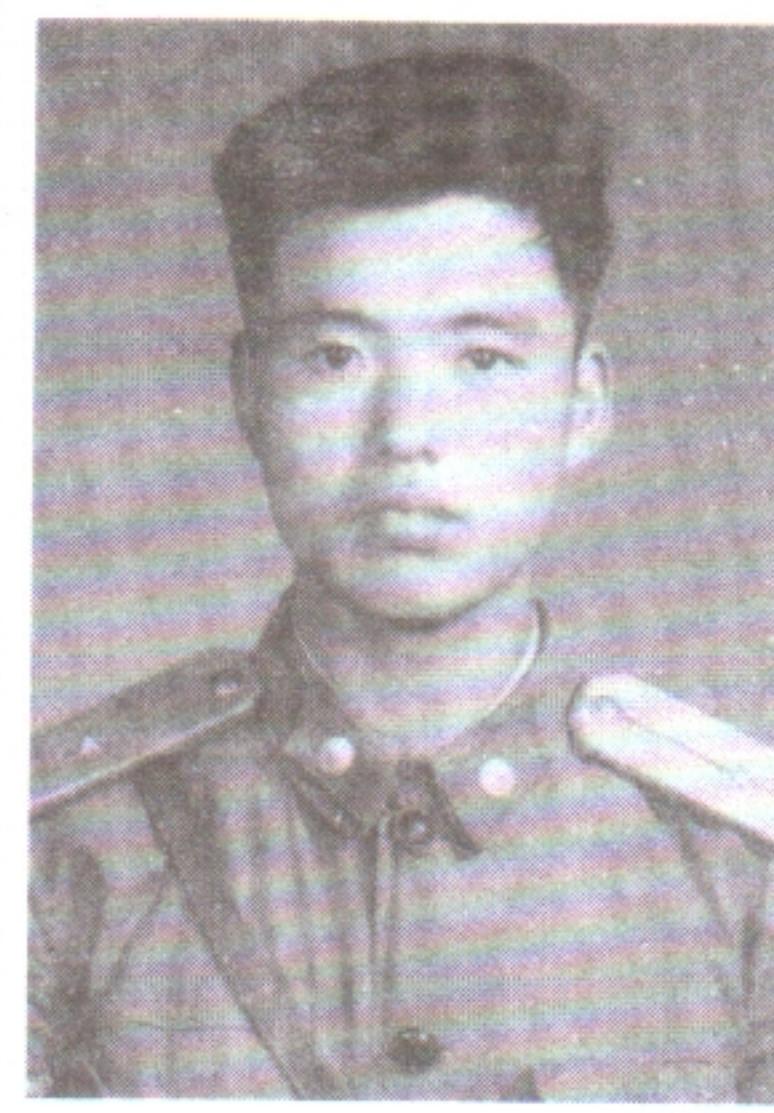


□ 周光才

1959年，是我们年轻的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之年。那时，美蒋以台湾为基础，一方面派高空侦察机RB-57D深入大陆腹地频繁进行战略侦察活动，一方面派P2V低空侦察机利用夜间深入内地进行电子侦察、空投特务、散发传单等，为他们“反攻大陆”做准备。1959年10月7日，刚刚组建不久的我低空导弹部队在北京郊区一举将美蒋RB-57D高空侦察机击落，开创了防空史上用地空导弹击落敌机的先例。在高空入侵遭到我军沉重打击之后，美蒋更是加紧用P2V入侵大陆纵深。1959年11月，我所在的空军探照灯兵某团奉命从要地防空转入辽东半岛沿海“机动作战”，配合高射炮兵打击P2V的侦察骚扰活动。

P2V飞机原是美国海军的一种侦察机，该机航程远，善于超低空飞行。为了对大陆进行侦察骚扰，该机加装了先进的电子设备，不仅可以在离地面二、三百米的高度夜航，还能及时发现我雷达波长、位置，回避我防空武器的跟踪打击。该机采用暗夜入侵，超低空飞行的战术手段，意在造成我情报雷达发现困难，难以连续掌握其飞行数据，我高速歼击机难以进行拦截，高炮难以对其有效射击。

“机动作战”的特点就是游击式的作战。部队根据P2V的活动规律，经常变动作战地域，从地处辽河口的盘山县到鸭绿江口的东沟县沿海，都是我们部队的机动范围，每到一地，我们不吃饭、不睡觉，首先架设、检查、校正武器装备，为了做到战斗警报铃一响，三分钟到达战斗岗位，部队住的是架设在阵地旁边的帐篷，夏天如蒸笼，冬天如冰窖。寒冬腊月，官兵身着棉衣，脚穿大头鞋，头戴棉帽睡觉。尽管条件如此艰苦，指战员的求战情绪却十分高昂。当时空军服役期是4年，老战士服役期满纷纷放弃探亲，“打落P2V再回家”成了他们的共同誓言。为了对付P2V的电子告警回避系统，参战部队上下广泛发扬军事民主，总结出“近快战法”，探照灯部队提出的战法是：“近距开机，开机就定位，定位就开灯，开灯就照中。探照灯瞄准雷达是探照灯的眼睛，我当时是雷达长，雷达一开机，地面上的山、空中的鸟群、飞机都显现在雷达屏幕上，外观上差不多，要在诸多目标中选择出敌机的目标定位，需要经验、



周光才，1939年10月生，山东莱阳人，1958年10月参军，1961年6月入党。1978年从空军某部转业到大连化物所，曾任所工会副主席，总务处处长，1999年退休。

灵敏、决心，还要与其它雷达操纵手高度的协同，为达到上述战斗战术要求，我们自觉加码练兵，关机苦练，开机精练，侧重夜训，逐步适应掌握了又近又快地一套战法，练出了“火眼金睛”。

1961年11月6日，时值初冬。这天夜间，天气清冷，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，上级指挥部指示：P2V今天夜间可能入侵东北地区。17点30分阵地待命，我驻长海县某岛雷达站发现P2V在外海正向我辽东半岛方向移动，部队全部进入一级战备。我部八连当时部署在城子坦地区碧流河口两侧，当敌机距八连阵地20多公里时，连指挥所及时获得了上级指挥所传来的敌机飞行数据，P2V正狡猾地向碧流河口方向八连阵地飞来，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，尽管敌机已到达我探照灯雷达捕捉定位距离，八连指战员坚决执行“近快战法”，雷达静默不开机，让敌机靠近些，再靠近些。直到时钟指向18时55分，敌机距最前沿821雷达探照灯站4公里时，站长才果断地下达了雷达开机命令，开机就定位，暗夜中一束探照灯强光划破漆黑的夜空，象一把利剑准确地照中了P2V侦察机，811站等10个灯站即刻接光，敌机全部机身被照得雪亮，高炮部队即刻开火，飞机起火并随即坠地爆炸。机上的国民党空军技术研究组副组长叶霖等13人全部毙命，此次战斗，从探照雷达开机到敌机被击落，时间不到30秒，创造了防空作战历史上探照灯与高炮协同作战的范例。

11月7日一早，时任我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大将、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上将乘专机从北京赶来辽东半岛前线，视察了被击落的P2V现场，接见了作战部队首长和作战有功人员代表，我作为参战部队的代表，也于当日上午从庄河阵地到被击落现场参观，分享了近两年机动作战的喜悦。

(上接1版)

在赵家棚休整时恰遇区党委书记陈少敏。她见女同志随部队行军打仗很不方便，于是将我和李钧调往区党委。我和李钧被分陪到民运部群众工作队，我任队长，李钧任指导员。我们没有休息，就下到黄陂县委蔡店区委工作。这个群众工作队有十几位队员，我们的任务是在县委领导下协助地方党委做地方民选工作。当时根据地已基本稳定，需要在基层建立政权，即

“三三制”民主政权。在开展工作中发生了一件使我终生难忘的事情：根据情报日本鬼子要对这个地区进行扫荡，县委指示我们在扫荡前组织群众破坏通往武汉的公路，阻止敌人行进。我们接到任务后立即召开村民大会进行动员和准备，各村接到任务后立即到打谷场开会，由我动员布置任务，明确责任。

然后我和李钧跑动指挥，大喊加油。

大约干了一两个小时，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，一会儿又下起了倾盆大雨，我们个个都成了落汤鸡。

虽然是在雨中作业，但觉得很安全，因为日本鬼子这时不可能出来，这倒使大家更加起劲地干起来。过了一会，领导下达命令要我们立刻返回。回到驻地，倒不觉得疲劳，因为我们已经出色的完成了任务。第二天县委派人来表扬我们，他们没有想到，领导这支工作队的竟是两位年轻的女同志。这段历史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，但它却深深的铭刻在我的记忆中，每当想起总感到十分骄傲和自豪。

(上接3版)

阳落山的时候，辗转到达楼子山。

在蔡家沟，我们回到武工队，同志们愣住了，过了好一阵儿，才抱起我们拍打着说，都以为你们回不来了……。车主任特别高兴地过来看我们，拍着我的肩膀说：祝贺你们胜利归来。时年，我未满17岁。

